

台湾基督宗教政治参与路径及其影响研究

韩 冰

摘要：基督宗教在台湾发展 400 余年，其倡导的价值理念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台湾基督宗教团体利用自身社会资源多、组织动员强的优势，频繁介入选举、“公民投票”与“大罢免”等政治活动，将其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投射至现实政治场域，在提升“立法”、行政话语权的同时，还屡借宗教“公共外交”助推“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基督宗教日益强化政治参与，不断扩张自身政治影响，给台湾社会文化变迁、政治生态演进以及台海局势走向增添复杂变量，其后续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台湾；基督宗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韩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979; 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 (2025) 05-0101-10

自 1624 年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强制传教以来，基督宗教已在岛内活动 400 余年，其积极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以及宗教实践，深刻塑造着岛内信徒群体的意识形态，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宗教复兴和非“世俗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岛内基督宗教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受到两岸及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1]但总体上看，学者对 2000 年以来，特别是当前台湾基督宗教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及其后续影响的分析与论述尚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拟以岛内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主要基督宗教教派为研究对象。在概述其发展现状及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展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灵粮堂”等基督宗教团体参与岛内政治活动的情况，分析它们同台湾主要政党的互动关系，刻画其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基本主张和现实影响，以期清晰准确把握基督宗教在岛内社会文化变迁、政治生态演进以及台海局势变化过程中扮演的复杂角色。

一、台湾基督宗教的现状及特点

基督宗教在台湾历经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清朝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战后时期四个阶

[1] 相关研究情况，参见黄飞君：《解严以来台湾政教关系研究综述》，《基督教学术》第十辑，2012 年 6 月，第 275-293 页。

段的发展演变，^[1]目前已是岛内佛教、道教之外另一股重要的宗教势力。整体而言，台湾基督宗教在组织形态、信徒数量、人群与地域分布、政治倾向等方面，呈现教派种类多、信徒体量大、政治立场迥异等特征。

（一）教派种类多样

当前，基督宗教的三大主要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均在台湾有所传播与发展，且长期维持天主教与新教较为强势、东正教相对低迷的分化态势。

1. 天主教。天主教在1626年由西班牙殖民者传入台湾。1642年，荷兰发动“第二次圣萨尔瓦多城战役”，西班牙人被迫离开台湾，天主教在台湾传播一度中断。1859年，西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传教士郭德刚（Fernando Sainz）及洪保禄（Angel Bofurull）等人自菲律宾经厦门抵达高雄，建立传教据点，为天主教在台湾后续发展打下基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天主教人数增至万人左右。1945年，台湾光复，岛内日籍神职人员被全部遣返，台湾天主教会教务改由中国神父主导。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一批大陆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信徒随之进入岛内，成为台湾天主教发展的主力，使台湾天主教得到快速扩张。1952年，台湾建立“圣统制”，原有传教区体制转为教区制，其教区数量从最初的1个“监牧区”，逐渐增加并改制为当下7个教区和1个“宗座署理区”。目前，台湾天主教会辖下有主教14人、神父600多人、修士100余人、修女1800多人，主要分布在岛内800多个教堂及教会分支机构。

2. 基督新教。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开始在台湾传播基督新教。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实施禁教政策，荷兰牧师离台。1683年，康熙派兵攻取台湾，收取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在岛内大力推广妈祖信仰，挤压基督新教活动空间。此后的乾隆、嘉庆继续实施禁教政策，台湾基督新教发展陷入停滞状态。1860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遣牧师赴台湾考察，发现台湾传教潜力巨大，建议总会将台湾纳入传教范围，“近代台湾的基督教传教事业拉开帷幕”。^[2]1865年、1872年，英国长老教会的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加拿大长老教会的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先后抵台传教，岛内逐渐形成加拿大长老教会盘踞北部、英国长老教会经营南部的基本格局。1949年之后，卫理公会、浸信会、圣公会、神召会等教派先后入岛，“使台湾成为全世界基督教派密度最高之地”，^[3]台湾基督新教进入迅速发展期。在这一时期，英国长老教会和加拿大长老教会于1951年合并成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2022年，“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教会发展中心”发布的“台湾基督教会普查报告”显示，目前岛内有83个基督新教教派，可谓“小派林立、山头并存”。^[4]

3. 东正教。20世纪初，东正教传入台湾，建有“台北基督救世主正教堂”。1949年，少数俄罗斯人以及东正教信徒随国民党进入台湾，成为岛内东正教的主要信仰群体。20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东正教活动陷入沉寂状态，仅存零星信徒。近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俄

[1] 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2] 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85页；刘凌斌：《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的教育事业（1860-1895）》，《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72页。

[3] 何绵山：《试论台湾基督教的发展与特点》，《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53页。

[4] “2022台湾基督教会普查报告”，<https://trends.ccea.org.tw/article/2022%E5%8F%B0%E7%81%A3%E6%95%99%E6%9C%83%E6%99%AE%E6%9F%A5%E5%A0%B1%E5%91%8A%E9%9B%BB%E5%AD%90%E7%89%8820230531.pdf>。

罗斯东正教会”加强对外传教，相继在台湾建立、恢复了东正教会。2001年，希腊籍神父李亮(Jonah Mourtos)赴台湾宣教，建立“台湾东正教圣三一教会”，并于2004年登记注册为“财团法人台湾省台北县基督教正教会”。2012年，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决定在台湾恢复“台湾基督正教会”，2013年在岛内重建“台北基督救世主正教堂”，于台中市、台南市分别设立“祈祷堂”。^[1]

此外，台湾还有“新约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基督教科学会”、“统一教”等基督宗教背景的新宗教团体，规模普遍较小，社会影响不大。

(二) 信徒数量庞大

近年，岛内多份社会调查显示，台湾基督宗教信仰群体约占全台总人口的7%，数量合计超过百万。^[2]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1. 天主教。202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若只能选择单一信仰，在台湾约2300万总人口中，有1.4%的民众信仰天主教，人数接近32万。需指出的是，因台湾当局不断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引入劳工，岛内外来天主教徒数量持续增加，其中，人数在15万左右的菲律宾劳工普遍信仰天主教。^[3]

2. 基督新教。2017年，台湾“基督教资料中心”朱三才牧师整理发布“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称，台湾共有基督新教信徒154.7万人，占岛内人口总数的6.6%。^[4]2022年，“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教会发展中心”公布“台湾教会普查报告”称，受疫情冲击，台湾基督新教信徒总数有所下降，目前约132万人。^[5]

在岛内逾百万基督新教信徒中，归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人数最多。据统计，“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教友数量约25.8万人。^[6]凭借信众数量优势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影响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活动经费相对较为充裕。该教会每年收到的教友捐款数量可观，仅2020年度的捐赠收入就高达2.9亿元新台币。^[7]此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还曾获得英国母会、加拿大母会、美国归正教会、美国传道归正会、基督教教育协会等境外基督新教组织提供的补助款。^[8]

[1] “台湾基督正教会简史”，<https://orthodoxchurch.tw/%E5%8F%B0%E7%81%A3%E6%95%99%E6%9C%83/%E5%8F%B0%E7%81%A3%E5%9F%BA%E7%9D%A3%E6%AD%A3%E6%95%99%E6%9C%83%E7%B0%A1%E5%8F%B2/>。

[2] 美国国务院：“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台湾部分”，2024年8月，<https://www.ait.org.tw/zhtw/zhtw-2023-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taiwan/>。

[3] 美国国务院：“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台湾部分”，2024年8月，<https://www.ait.org.tw/zhtw/zhtw-2023-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taiwan/>。

[4] “2017年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https://www.ccea.org.tw/cceaup/church/christianityreport/2017.pdf>。

[5] “2022台湾基督教会普查报告”，<https://trends.ccea.org.tw/article/2022%E5%8F%B0%E7%81%A3%E6%95%99%E6%9C%83%E6%99%AE%E6%9F%A5%E5%A0%B1%E5%91%8A%E9%9B%BB%E5%AD%90%E7%89%8820230531.pdf>。

[6] “2017年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https://www.ccea.org.tw/cceaup/church/christianityreport/2017.pdf>。

[7] “财务资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网站，<https://donate.pct.org.tw/Download/%E8%B2%A1%E5%8B%99%E8%B3%87%E8%A8%8A.pdf>。

[8] 段文勇：“揭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面纱”，中国评论通讯社，2009年4月4日，<https://hk.crntt.com/doc/1009/3/3/100933313.html?coluid=123&kindid=0&docid=100933313>。

3. 东正教。目前，在台湾传播发展的两个东正教会规模均很小，仅百余人参加活动，但仍积极探索“在地化”的适应和发展之路。^[1]

(三) 人群、地域分布集中

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岛内不同族群、阶层对基督宗教的接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台湾基督教徒分布整体呈现“闽南人、少数民族、中产阶层”的特点，且主要集中在北部城市区。

1. 闽南人。台湾闽南人族群较易接受基督宗教信仰，与传教士使用闽南语传教联系密切。由于闽台之间存在特殊地缘关系，台湾早期移民多为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居民。晚清时期，台湾又是隶属厦门而新发展出来的传教区，传教士通常先在厦门或抵达台湾后学习闽南语，“将传教首要对象锁定在台湾的漳、泉等闽南人群”。^[2]受此历史因素影响，台湾信仰基督宗教的人群中，闽南人族群的占比较高。

2. 少数民族。早期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人员跟随殖民者进入台湾时，即有岛内少数民族（主要为“平埔族”）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台湾光复后，西方宗教团体派人携带食品、药物等物资进入山区传教，帮助岛内少数民族解决食物匮乏、缺医少药等现实困难，“一时间，族群成员纷纷入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盛极一时。”^[3]2017年“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显示，高雄、桃园、台东、花莲、屏东等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县市基督徒占比普遍较高。台湾劳动事务主管部门2022年统计数据也称，在全台约58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多数为基督新教徒或天主教徒”。^[4]

3. 中产阶层。岛内学者指出，1945年台湾光复时，基督新教已在台湾具有一定社会基础，“其信徒中有闽南文化中高层阶级的商人、公务员、医生、教师、律师”。^[5]2000年以来，基督宗教仍持续吸引高学历者以及青年群体加入。以信徒数量最多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例，其信徒“年龄15岁至39岁的人最多，职业以公务人员最多，商人次之，平均文化程度较高”。^[6]

4. 北部城市区。经济发达、文教资源丰富及跨境交流便利的北部城市是台湾基督宗教群体较为集中的地区。以2017年的“台湾基督教会教势报告”为依据观察岛内基督徒分布可以发现，基督徒人数居前六位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与桃园市。从堂会数量方面来看，大城市的堂会数量明显多于偏远乡村地区，前三名分别为台北市、新北市与台中市，“不管是在基督徒人数上还是在教会数量上，北部都占据优势”。^[7]

[1] 刘智豪：《东正教在台湾的现状及其适应》，《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第54-58页。

[2] 李长瀚：《反思百年来基督宗教在台的现代化历程》，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研究计划暨论文发表会论文，2006年12月，第5页。

[3] 彭维斌：《台湾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52页。

[4] 美国国务院：“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台湾部分”，2024年8月，<https://www.ait.org.tw/zhtw/zhtw-2023-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taiwan/>。

[5] 丁立伟、雷敦龢：《基督徒如何参与台湾的族群和谐》，台湾《神学论集》第124、125期（2000年夏、秋），第262页。

[6] “台湾百科”，中国台湾网，2001年4月，http://www.chinataiwan.cn/twzlk/zj/200104/t20010413_35589.htm。

[7] 陈明丽：《基督教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复兴”新趋势》，《基督宗教研究》第26辑，2019年12月，第397页。

（四）政治倾向迥异

因坚持特殊历史传统和保守神学理念，台湾基督宗教大多主张“政教分离”，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同台湾当局保持相对平顺的政教关系。以信徒人数超过10万的“召会”为例，该教会长期坚持“不碰政治”的神学立场，专注宣教，不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与“召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该宗教组织深受加尔文政治神学影响，认为教会须在岛内社会扮演“先知”与“祭司”角色。^[1]“戒严”时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与台湾当局政治摩擦不断，并于1977年发表所谓“人权宣言”，公开鼓噪“台独”立场。“解严”后，该教会迅速与民进党“合流”，逐步成为绿营“基本盘”和“铁票仓”。除上述两大教会系统外，岛内信徒数量较多的“台北灵粮堂”、“台北真理堂”、“台湾信义会”等教会团体，其早期领导人物以及信徒多为随国民党迁至台湾的“外省人”，该群体是“国民党当局忠实拥护者，影响所及，至今这些教会在选举时仍多为国民党支持者”。^[2]

（五）小结

基督宗教在台湾传播、发展四个世纪，能够在岛内站稳脚跟且发挥重要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基督宗教紧跟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的脚步较早进入岛内，在漫长传播过程中，为自身发展多次主动变革，较好适应了台湾当地环境。其次，基督宗教通过建立医院、开设学校、开展慈善等方式，深度介入岛内民众日常生活，以解决台湾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问题、满足部分群体现实需求的方式，提升社会形象，并对信徒产生较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后，岛内剧烈的社会变迁为基督宗教在台湾发展壮大提供历史机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神职人员及大陆信徒大量迁入、经济社会状况不稳定、山地胞民大量皈依等因素使得基督教迅速扩张”，80年代后“中产阶级的壮大、教育人口的增多、福音宗派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基督教对年轻世代的吸引力”。^[3]

二、当前台湾基督宗教参与岛内政治活动的形式与路径

以1987年国民党当局“解严”为标志性时间节点，台湾各类政党、社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逐渐形成政党多元竞争的政治格局。在此语境下，台湾基督宗教利用其自身掌握的丰沛社会资本，通过多种方式积极介入岛内政党政治。目前，台湾基督宗教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的态势进一步延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灵粮堂”等宗教团体，以支持特定政党、发起社会运动等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和影响，意图在岛内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一）主导或参与政治活动支持特定政党

在岛内数量众多的基督宗教团体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政治倾向最为明显，参政意愿也最为强烈。该教会长期鼓吹“民主、本土、自决”，是台湾第一个公开主张“台独”的基督宗教团体，也是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主要代表。近年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频繁走

[1] 武永生、袁义昕、张证豪：“政治参与暨教会发展—台湾两大基督教会神学背景之观察与初探”，2014年5月，http://www.wnee.net/html/zhuantiyanjiu/jidujiaoshixue/20140520/33830_5.html。

[2] 杨凤麟：《台湾基督教保守反同运动中的外省族群失家因素及多重“家”概念分析》，台湾《辅仁宗教研究》第46期（2023年春），第56页。

[3] 刘子曦：《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基于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07页。

上台前，卖力充当民进党“绿色独裁”、“抗中谋独”政治打手。

2024年岛内“二合一”选举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布“2024年选举支持准则”，公开要求教会成员支持民进党及其候选人赖清德。2024年5月，赖清德上台后不久，黄春生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纠集岛内多个“独”派团体，鼓动绿营支持者发起所谓“青鸟运动”，意欲助赖清德改善“双重少数”执政困境。2025年初，民进党为抢夺岛内立法机构主导权，削弱国民党、民众党制衡能力，实现“一党独大”、“完全执政”的政治目的，发动了针对部分国民党“区域立委”的“大罢免”。在蓝绿两党展开“罢免”与“反恶罢”激烈政治攻防的过程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公开发表声明煽动信众“挺绿反蓝”、自发招募义工协助“罢蓝”团体、利用教堂设立连署据点等方式，竭力配合民进党罢免国民党“立委”。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除帮助民进党当局打击在野政党外，还竭力操弄“反中”、“乱港”等敏感政治议题，借机煽动“抗中保台”民粹。2019年以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连续主办“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以“宗教自由”为幌子，勾连美西方政客，肆意抹黑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202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又联手“台湾香港协会”、“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数十个“反中”团伙，举办“抵制2022北京冬奥全球行动日”记者会。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表态支持“黑暴分子”，^[1]协助200余名“港独”分子逃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大楼地下室对其进行培训。同时，隶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台北济南教会”还花费1500万元新台币，采购头盔、警棍等物资，分批运送至香港，公开支持“乱港”势力破坏香港社会公共秩序。

（二）发起社会运动引导社会思潮、改变法律制度

民进党为争取青年群体选票，长期鼓噪并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所谓“进步”议题。该行径与基督宗教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以及日常生活原则相悖，遭到岛内多家教会强烈反对。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然勾连台湾主要政党、直接参与政党斗争的做法不同，“台北灵粮堂”、“台北真理堂”、“新北行道会”等较具影响力的基督宗教团体，以维护传统家庭伦理为诉求，动员道德观念立场相对传统的信徒，多次发起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运动。

为强化上述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这些基督宗教团体先后成立维护传统家庭婚姻价值观的“台湾维护家庭联盟”、“下一代幸福联盟”、“信心希望联盟”、“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等公民团体，邀请前新党“立委”雷倩及宏达电创办人王雪红等加入，凝聚多股社会力量共同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组织的骨干多为岛内基督宗教界的意见领袖。以2007年3月成立的“台湾维护家庭联盟”为例，其时任执行长为辅仁大学神学院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齐明，“台北真理堂”牧师杨宁亚担任主要召集人，“台北灵粮堂”牧师叶岭楠为副召集人。

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后，部分基督宗教团体继续利用游行示威、“公民投票”（以下简称“公投”）等方式，反制民进党当局操弄“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2016年12月，“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发起大规模“反同婚”游行示威活动，吸引20余万人参加，要求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交付“公投”，并从课纲及教材中删除有关同性婚姻教育的内容。2018年，岛内基督宗教团体发起多项“反同婚公投”，其中，第10案“你是否同意‘民法’

[1] “港媒：资助香港暴徒、鼓吹‘台独’的台教会网站被封”，环球网，2021年4月26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sORwQwLob>。

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第 12 案“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等三项“反同婚公投”提案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对台湾当局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产生直接影响。2019 年 2 月，台湾行政机构依照上述“公投”结果，以不修改“民法”、另立“专法”的方式，提出“司法机构释字第 748 号解释施行法”（即“同性婚姻专法”）草案，并于同年 5 月 17 日在立法机构“三读”通过，5 月 24 日正式生效。

（三）依托教会势力组建政党参与台湾选举

近年，岛内一些基督宗教团体利用社会转型以及政教关系嬗变带来的政治空间，以“反同性婚姻合法化”为契机，主张“与其依靠政党发声，不如由娴熟圣经教义、了解教会使命的教徒直接参与政治”，^[1]积极串联各地教会与信众，“以教会界高层知名领袖与牧师组成领导团队，地方教会则提供行动所需之人力串连与资源动员协助，发展出专业化的政党组织以开展运动”。^[2]其中，以“信心希望联盟”、“安定力量”、“合一行动联盟”等“第三势力”政党最为典型。这些政治组织的成员虽不局限于基督徒，但皆有教会背景。

2016 年，“信心希望联盟”以“摆脱现有的蓝绿意识形态，着眼未来发展议题”为目标，提名 10 名“区域立委”及 6 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参选，获 22 万政党票，1.70% 得票率，但被提名人均未当选。2020 年，“安定力量”、“合一行动联盟”推出 40 余名“立委”候选人参与竞选，提出“生命法案”等带有鲜明宗教价值观念的竞选主张，且得到北部颇具影响力教会“台北灵粮堂”牧师周神助、“台北真理堂”牧师杨宁亚、“台北基督之家”牧师寇绍恩等人支持，但分别只得到 0.67% 与 0.123% 的政党票，在“立委”选战中遭遇惨败。

需指出的是，基督宗教背景的政党虽接连遭遇选举失利，但不同于岛内其他“第三势力”小党，“信心希望联盟”、“安定力量”、“合一行动联盟”等因有教会作为动员机器，加之其可利用宗教信仰与情感凝聚支持者士气，故未因选举受挫而立即溃散。有岛内学者还对基督宗教背景的政党未来发展抱持乐观态度，称“只要坚持走中道之路，掌握政策议题，反映选民需要，形成一支团结的基督教政党，其前景自是大有可为”。^[3]

三、台湾基督宗教政治参与的现实影响评估

当前，台湾基督宗教以价值理念、宗教情感为动员手段，发挥组织架构相对严密的优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对岛内政治生态演进、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乃至两岸交流都有一定影响。

（一）公共政策影响力与话语权持续扩张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灵粮堂”等基督宗教团体鼓励基督徒参政，在“九合一”、“二合一”等重大选举活动中，公开为具有基督宗教背景的政党候选人助选。因此，基督宗教信徒

[1] “反同教会‘8大老’力挺组党，孙继正将推逾 10 席‘立委’参选人”，台湾“上报”，<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7oYKmk>。

[2] 杨凤麟：《台湾基督教保守运动的策略营造、政治组织发展与运动动员分析》，台湾《华人宗教研究》第 23 期（2024 年 1 月），第 121-169 页。

[3] 周阳山：“基督教政党的发展与在台湾的考验”，台湾“新大学”网站，<https://theintellectual.net/zh/moon-and-moon-earth/golden-sound-jade-duo/135-the-development-of-christian-political-parties-and-the-test-in-taiwan-zhou-yangshan.html>。

在岛内立法机构、行政部门担任“公职”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台湾政坛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势力。

早在2002年，台湾立法机构225名“立委”中，6人是天主教徒，21人是基督新教教徒（其中15人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徒及民进党员）。^[1]2008年，台湾立法机构改革，“立委”席次减半，开始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基督宗教背景的“立委”数量总体保持稳定，长期维持在20人左右。2012年，赖士葆（国民党籍）、赵天麟（民进党籍）、张晓风（亲民党籍）等20余位跨教派、跨党派基督徒“立委”，在立法机构成立团契组织，每月固定举行聚会活动，“共同推动社会关注的政策与法案”。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当选“立委”的赖士葆、罗智强（国民党籍）、郑天财（国民党籍）、林宜瑾（民进党籍）、王定宇（民进党籍）、伍丽华（民进党籍）、吴春城（民众党籍，2025年2月因“壮世代”争议请辞）等人亦皆为基督宗教信徒。

除“立委”外，部分有基督宗教背景的政治人物还担任了地方县市“公职”。据岛内基督宗教媒体统计，2022年“九合一”选举，共有119名基督徒当选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村里长，包括2位县市长和5位乡镇市区长，县市议员36人，乡镇市区代表及村里长76人，其代表人物有基隆市长谢国樑（国民党籍）、澎湖县长陈光复（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曾献莹（国民党籍）等。^[2]

此外，在民进党当局众多官员中，亦不乏基督宗教背景的政客。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联系紧密，具有强烈基督宗教情结。赖清德自述担任台南市长时有过教会生活，担任“立委”期间也曾到台北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做礼拜。^[3]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等都曾公开表明基督徒身份。

这些基督宗教背景的“立委”、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台当局官员，多较为关注教会立场及利益。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极具社会争议的公共事件时，他们甚至会选择公开“抱团”发声，对公共决策乃至司法判决直接施加影响。^[4]

（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组织动能不断增强

台湾长期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普通民众还是相信儒家”。^[5]因此，台湾社会主流文化极为重视尊重、包容、和谐、孝道等家庭伦理，这同岛内绝大多数基督徒坚持的价值理念、宗教立场高度重合。

近年，岛内部分政党和社会团体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基础上继续鼓噪“多元性别”（LGBTI）等激进议题，但屡遭教会团体强力抵制。“台北真理堂”、“台湾幸福家庭联盟”等基督宗教团

[1] Cheng-tian Kuo,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44.

[2] “九合一选举专题：教会牧者选后观察”，台湾“好消息国度报道”，2023年1月12日，<https://goodtvnews.goodtv.tv/goodtvnews/2022video289/>。

[3] 赖清德：“宽恕的果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网站，http://www.pct.org.tw/article_faith.aspx?strContentID=C2010091500005；“长老教会牧者拜访赖清德”，“台湾教会公报”，2021年1月，<https://cnn.org.tw/archives/81032>。

[4] 参见台湾“基督教论坛报”，2024年9月30日，<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10&article=1399929&fontsize=2>。

[5] “专访台湾儒家李明辉：台湾仍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澎湃新闻，2015年1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5430。

体认为，台湾社会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家庭价值观沦丧”，“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幸福家庭核心价值”，为此提出“四守”家庭价值观。^[1]他们以“幸福家庭守护者”的姿态，坚决反对“婚姻平权”、“多元性别”等思潮，在岛内塑造了保护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的舆论氛围，借此持续影响台湾社会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督宗教团体和政党在将宗教资源转化为影响现实生活的社会资本时，主要借助观念与组织的合力作用。其具体模式如下：以维护宗教价值、神学理念为旗帜，借教会机构、领导人物的宗教权威以及公共神学理论对信徒进行组织动员，利用“空战”、“陆战”相结合方式推升自身影响，“鼓励运动参与者走出教会范围”，进入社会领域持续发挥作用。^[2]

（三）日益成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岛内天主教同罗马教廷联系密切，是台湾当局利用宗教“公共外交”，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时极力争取的合作对象。一方面，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是台湾当局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过去一段时期，陈水扁、马英九等台湾地区领导人数次前往梵蒂冈参加宗教活动，“有增强台湾‘国际能见度’的重要目的”。^[3]另一方面，梵蒂冈因其“世界天主教信仰中心”的特殊地位，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力巨大。目前，在台湾除梵蒂冈之外的 11 个“邦交国”中，海地、危地马拉、巴拉圭、圣卢西亚、伯利兹为天主教国家，马绍尔群岛、帕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的主要宗教之一是天主教，宗教意识形态上属于同一阵营。

民进党当局为维系“台梵关系”、巩固“邦交国”数量，极力拉拢台湾天主教势力，甚至直接安排天主教徒担任重要行政职务。蔡英文时期，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行政机构负责人的陈建仁就是天主教徒，且数次“窜访”梵蒂冈，竭力维护“台梵关系”。今年 4 月，罗马教皇方济各去世后，民进党当局视此为拉拢天主教“邦交国”的重要契机，跟风进行政治作秀、伺机推动赖清德“窜访”梵蒂冈，同时利用“亲绿”天主教人物大肆污蔑抹黑中国大陆宗教政策，意在推高国际社会天主教国家对华敌意，阻拦梵蒂冈同中国改善关系。

除天主教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迎合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路线、主动加剧“台湾问题国际化”方面亦用力颇深。近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利用其在美分支机构，联手“北美台湾人基督教协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以“敲边鼓”方式，极力为“美台关系”升温助势。2022 年 5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教堂发生枪击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美举行记者会，声称作案者与“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关联，借机施压美国政府严惩美国境内统派团体。近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共组“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以“美国长老教会驻联合国办公室”为渠道，在联合国总部公开鼓噪“联大 2758 号决议和台湾无关”，配合民进党当局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妄图混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共识，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1] “基督徒要成为家庭守护者”，<https://w2.goodtv.tv/newsletter/uploads/files/8997246ac25905fb3337d69b445bc50c.pdf>。“四守”系指：守约：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守贞：婚前守贞，婚后守约，家庭健康；守份：夫妻守份，人人有责，家庭和乐；守成（承）：生养祝福，管教得宜，代代相传。

[2] 杨凤麟：《台湾基督教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社会脉络及其关连性》，台湾《辅仁宗教研究》第 44 期（2022 年春），第 53-76 页。

[3] 陈方中：《台湾与教廷“外交关系”新展望：一个台湾教友的意见》，台湾《鼎》，2016 年冬季刊，第 27 页。

结语

基督宗教在台湾传播、发展400余年，当前信徒人数虽远少于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但其政治能量及社会影响不容小觑。同时，受文化传统、社会环境、选举制度等诸多条件限制，基督宗教参与岛内政党政治的行为，既不是影响台湾政局的决定性因素，也未使台湾“蓝绿争斗”、“统独对立”的政治主轴发生结构性变化。

基于这一原因，本文对台湾基督宗教的现状特征、政治参与情况及其产生的多重影响进行了简要梳理。结果表明，在台湾宗教现象丰富、宗教团体功能多元、统“独”政治因素交织的语境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灵粮堂”、“安定力量”、“合一行动联盟”等基督宗教团体，凭借组织动员优势，利用岛内社会转型和政教关系嬗变带来的空间，以多种方式积极介入“公投”、选举等政治活动，在给台湾社会文化变迁、政治生态演进增添复杂变量的同时，也对两岸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伴随岛内政党恶斗加剧以及民进党当局持续升级“反中抗中”、“倚美谋独”路线，台湾基督宗教是否会以全新方式参与岛内政治活动并产生更大影响，值得持续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徐子洋)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Han Bing

Abstract: Christianity has developed in Taiwan for over 400 years, and the values it advocat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sland'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have leveraged their abundant social resources and advantage in mobilization to frequently engage in elections, referenda,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like the “great recall.” By projecting their influence from the religious and ideological sphere into real-world politics, they have enhanced their say in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sectors, while also using religious “public diplomacy” to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increasing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Taiwan’s Christian community expands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roduces complex variables affec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Taiwan Strai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arrants continued attention and study.

Key Words: Taiwan; Christianity;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